

本土的矩陣——後殖民時期香港的燥動與寂靜

文/周思中

零三七一至今剛好十年，這十年來，香港政界和社會運動可稱車水馬龍絡繹不絕。本文嘗試以近年的本土（眾數）運動為軸心，斗膽討論香港的時代問題。

一、哪種政治？

香港並不是一件可移動的實物，「回歸」也就不涉及任何空間條件的變化；反之，「回歸」二字屬時間範疇，指向殖民階段的結束，香港主權收歸中國。然而，民族主義史觀的失而復得邏輯，並不必然重疊於解殖框架裡的自主主體，殖民地狀態的中止，並不等於向香港主體性開綠燈。若香港回歸後進入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新時代，這時代特定的歷史思考，便在於香港的自主性應如何定位，座標是甚麼。中國經濟起飛，各種「大禮」源源不絕，這就是香港自主性的條件嗎？透過接收各種經濟上的優待，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以至民族感情，就是擺脫及反省殖民地的遺留嗎？懷舊和抗共是不是第二條路？空間規劃及社會政策上與內地區隔，維持回歸前的管治及文化格局，在回歸後的時空是甚麼意思？有沒有第三條路？

以皇后碼頭為例，由政府到歷史學者到不少平民百姓都認為，這是殖民地的象徵，將之鏟平建成大馬路和商場，既移除殖民符號又促進經濟發展解決中環交通擠塞，豈不相得益彰？問題是，假使殖民地年代殖民者對香港人爭取公民權工人權平民百姓生計權拖得就拖，而特區年代的統治者繼續複製這種管治關係，貧富懸殊背景下的經濟發展究竟是延續舊有的結構，還是對之的超越？

將「本土」定位在突破懷緬殖民地的舊日子與重回母體擁抱內地經濟機遇這組假對立，進路難免有點迂迴，但迂迴的盡頭，卻是解放的視角——解放出主權回歸就是解殖，懷舊反共就是自主的雙重幻覺。反高鐵及保衛碼頭的幾年運動，在具體運動目標之外，就是嘗試釋放這種時代可能性。

然而，圍繞著「本土」的論述及民情，當然不一定困於這組問題意識內。事實上，為協助本港走出千禧年前後亞洲金融風暴及沙士所帶來的經濟低迷，內地與香港於2003年簽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從此，由電影到自由行，由會計銀行到採礦相關的服務，由翻譯到鐵路運輸，由教育到醫療到會展到社會服務，香港都有優待[i]。由2003年到2011年，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由十八萬元上升至接近二十七萬元（當然，代表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香港幾十年來持續增長，而且名列前茅）。這不啻是祝福和詛咒的雞尾酒：當香港人正從低迷的經濟喘過氣來時，突然發現藥房的奶粉被搶光了，上水火車站被水貨客擠滿了，醫院產房的設備都給雙非孕婦預約了，房地產給暴發戶炒得不亦樂乎，市區著名的購物商場聽到的全是普通話，連入電影院都被迫要看沒有鬼神及黑社會的合拍片。

香港在中央政府大力輸送各種「好處」的情況下，有口難言。所謂「本土」，在這社會氣氛之中，便難免由先前批判歷史麻木的角度被重新轉化。而轉化的方向，卻是走向某種訴諸情緒及自我保護的意識：簡言之，香港就是本土，內地就是他者，但這裡

的他者並不邊緣，而是財大氣粗力拔山兮。反之香港才是那告急、憤怒、冤屈、反撲的主體。這種「本土」觀點以文化評論人陳雲的「城邦自治論」為理論基礎，以「香港自治運動」為組織平台，大幅使用臉書之類社交網站為活動空間。兩種「本土」不僅語意有別，組織形式、政治目標迥異，兩派之間甚至互相敵視，以「左膠」和「法西斯」之類稱呼互相攻擊。顯然，在目前的社會經濟氣氛裡，談本土而不反雙非自駕殘體字，難免有投共之嫌，殖民地時期的官僚、司法制度等「核心價值」，不假思索之下，亦隨時成為香港唯一值得捍衛的優越感。

兩種本土，究竟是甚麼關係？比較兩種觀念，前一種本土反思後殖處境，以建立（將臨的）解殖主體為目標，後一種本土，其實不過將本土重新挪移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將時間維度剔除，殖民遺產由需要批判地反思的對象，吊詭地回朝成為我們甚至要捍衛的政治及文化基本結構。但從歷史發展來看，以城邦自治之名的本土，卻是出現於以解殖為任務的本土之後，這先後次序的意義是甚麼？是城邦本土揚棄了解殖本土，排斥性的本土才能直達本土的真意嗎？回歸後的香港，究竟需要哪一種政治？

Detour：燥動和寂靜的二十世紀

馬克思的史觀當然是唯物及辯證的，歷史發展透過生產力的發展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每個階段對上個階段的否定，都進一步示範歷史發展的真相。但若我們將顯微鏡對焦在馬克思主義的領域，到底由馬克思建立學說，到列寧十月革命推翻封建沙俄建立地球上首個社會主義聯邦，再到史大林極權鎮壓異見的大災難，又是否客觀必然？又或者，道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相？這就是齊澤克在其為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Georg Lukacs）編輯的《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s》裡所提到的問題[ii]。

然而，尤其若從革命的觀點看，真正的問題不啻是如何把握由列寧到史大林這發展的邏輯必然性，同時不輕率否定十月革命推翻沙俄的革命意義。意思就是，我們究竟是清晰辨別史大林的往後發展，如何從相反方向限定／辨別了十月革命的真正革命意義，抑或是不過想藉著史大林惡貫滿盈的所作所為，一併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意義徹底否定。後者是某種流行的論調，以「任何良好意願的革命，最後都會重複其所推翻的舊政權的惡行，甚至更差」，又或者總結出某些諸如「工具理性」等巨型概念，將問題歸咎為某種人類本性或劣根性。這分析進路的問題，就是其結論的威力太強，過於橫掃千軍，不僅個別革命事件的的的革命意義被取消得一乾二淨，更嚴重是隨時將任何改革的可能性都先驗地否定。

最廉價的結論就是，革命確實發生了，封建帝制推翻了，但往後事態發展所造成的災難，算賬竟算回十月革命甚或馬克思身上：這難道不是宿命和反動的雙重咒語麼？這裡的概念吊詭，就是若馬列史的發展是客觀必然，則整套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休矣；又或者說，若以史大林最終導至人類大災難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性，則批評者豈不本身才是秘密的唯物史觀信徒？無論如何，同樣悲觀。革命還有沒意義？更進一步，人的能動性是否只是假象？

二、盧卡奇的逆襲

正是在這理論困境中，由二十世紀初十月革命活到七十年代的盧卡奇便相當有啟發性。盧氏今天為人認識之處，或許是戰後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分析由他借來的概念「物化」（reification）。這概念本來是指在連勞動力都商品化的社會裡，工人的意識亦

同樣單子化，不會主動從階級視角看與自己同樣處境的工人，更難言能夠從階級的視角搞革命。雖然這概念及其分析其實具濃烈的列寧主義味道，即工人若沒有先鋒黨領導最多只能自發出庸俗的工會意識。但經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二三四手詮譯後，這概念不啻成為了概括性極高對現代社會的一般描述，具體的脈絡及組織行動意味全被抽空。

另一方面，盧氏在哲學史的隱沒，難道不正好是一個案例，說明列寧主義的命運嗎？查盧氏於十月革命後的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失敗後，流亡到瑞士時認真閱讀列寧的作品，並寫下經典的《歷史與階級意識》[iii]。在這部作品裡，他指出階級意識並不與生俱來，亦不與工作崗位俱來，而是鬥爭的產物，也就是說，工人階級意識薄弱，並不偶然或自然而然，而是階級鬥爭（不成功）的結果；從這點，他指出了先鋒黨的關鍵戰略意義：工人在物化社會中傾向誤認自身只是個別的勞動力售賣者，其主體的實現在政治經濟關係中被系統性地持續否定。要突破這點，便需要先鋒黨組織階級鬥爭，令無產階級在鬥爭的過程中建立具戰鬥性的階級意識。

當社會其他階級都能以其所擁有的財產、地位，定義自身在社會的位置時，盧氏認為，吊詭地，無產階級的核心就是「無」或被剝奪。其社會位置的特徵就是「脫臼」。無產階級這特殊階級的「脫臼」性質，亦正是其之於社會其他階級的普遍性維度。因此，無產階級的人數多寡，並不充份決定這階級是否具備普遍性；從總體性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社會的暢順運作，必需建基於對無產階級的系統性剝削——這就銘刻了無產階級之於社會的普遍性，也是扭轉改寫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係的關鍵階級。要實現其主體性，無產階級並不是要確認其實存的社會位置，然後向資本家要求更多的福利或更好的勞動條件，而是以無產階級為阿基理德腳跟，根本地扭轉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及配置。

在這意義下，相對於歷史發展客觀必然的決定論，他認為革命更需要強調主觀性，這主觀性體現於能否體察鬥爭的戰略性時刻，結連的對象等。革命不能等待所謂「客觀時機」成熟，因為資本主義的強項是動員各種資源（包括殖民阿非拉國家，剝削其天然及人力資源，補貼歐洲工人緩解危機）吸納消滅反對力量。革命的注碼就是在「條件未成熟」情況下的突襲，創造新形勢，改變不同力量之間的「客觀」關係。換言之，「條件未成熟」下的介入，並非平白撞牆，而是為了改變「條件未成熟」這判斷的標準；又或者，貨真價實的革命事件，從來不可能化約為單純理論及客觀條件等因素可以計算及預測，無論如何化約都總餘下主觀判斷、意志的維度。

在齊澤克眼中，這就是盧氏列寧主義哲學的高峰。盧氏清醒地把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動態內核：不能假設工作崗位是工人者便有無產階級革命意識；此外，不能假設歷史發展會按某個客觀的藍本進行。這兩個關鍵環節，卻恰好是二十世紀初大部份歐洲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前提。這些無法假設的環節，對盧氏而言便是共產黨的鬥爭場域，行動、政治之所在。此等觀點的實際體現，就是十月革命。沙俄當時的情況未有按馬克思所配方的先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才有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列寧將沙俄與無產階級革命直接短路，在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基礎及工人階級基礎同樣尚未完全鞏固之前，便把握時機建立蘇聯政權。

三、預言式的批判（及事後被否定）

這就是盧卡奇的列寧主義革命觀，事有湊巧，盧卡奇發表《歷史與階級意識》的一九二三年，剛好是列寧多次中風的一年，史大林乘勢抬頭。雖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

義」被史大林奉為國家官方意識型態，由革命黨過渡到執政黨，革命理論亦被改寫為治國的合法性基礎。

這新形勢亦啟動了對盧氏理論的批判。批判圍繞著辯證法的適用範圍：源於對大自然觀察的辯證法，是否適用於社會？盧氏的批評者認為在自然界生效的辯證法同樣決定社會的變化，因為社會按客觀的規律變化，強調意志就是否定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盧氏在《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觀點當然認為辯證法不能直接由自然界搬字過紙，社會變化更替與自然界有別，社會屬於人類意識範疇，政治行為及革命並不能化約為客觀定律的推演。盧氏建基於列寧主義革命觀的觀點，在史大林當權的氣氛下，便被定性為唯心主義而遭否定。

新形勢下，馬克思主義由挑戰封建制度的革命理論化身為治國的意識型態及合法性基礎，強調專政的客觀必然性，當然比強調革命意志更重要。列寧主義的先鋒黨領導群眾，乃出於革命這總體目標，到史大林時期，當革命不再是黨領導群眾的原因時，黨與人民的同一性就成為唯一的統治合法性，以至高壓統治的理據。列寧主義整套革命觀念建基在「脫臼」、被系統性排斥的無產階級，以及在未成熟／不可能的環境下迫出可能性。史大林主義時，列寧的問題意識已不再適用，共產黨及無產階級已成為國家的統治者及「主人」，政治問題也不在於迫出可能性，而是如何守業、借勢、用勢了。

在這意義下，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早在史大林主義的高峰前已事先提出批判。這預告了盧卡奇不僅無法在史大林年代重申其列寧主義觀點，列寧之於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性，更會隨著盧氏彷彿被靖綏而一併埋葬在對史大林主義的攻擊中。

四、港版雙重詛咒

從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看香港（而又不特別針對香港的左派政治），表面看難免有點不倫不類蚊脾牛蟬。筆者嘗試提出的問題是，經常被掛在口邊的「政治」兩個字，到底在甚麼地方？盧卡奇及列寧的經驗，說明政治發生於不可能的地方，又或者，只有在條件不許可的情況下才有嚴格意義的政治行動（或稱革命）。

回頭看香港，零三年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宣告了香港民間社會的興起，無論當年開始遍地開花的網絡電台（以至後來新興政黨如公民黨、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等都紛紛效法，辦網台作為其官方喉舌），以至零五年反世貿韓國農民抗爭啟發了往後許多街頭抗爭的態度及形式，零七至零九年間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保菜園等，運動的核心組織者甚至都並非職業傳統工會和政黨人員，組織及資訊傳播都不依賴其組織機器。運動沒有向議會政治匯流的傾向，或突入的動機。

更顯著的是一個名為「社會」的場域似乎嶄露頭角。在這場域裡，行動者面對多重的攔截：一直以來只希望把人民封鎖在無根狀態及消費意識的殖民管治、樂於接收及延續這種管治，同時不斷嘗試以「中國市場」引導／創造新型中港關係的特區政府、政治上不斷推延阻止香港人政治民主選舉權的中央政府。香港回歸後不斷強化的市區重建、中港融合空間規劃、國民教育等政治經濟上的大興土木，就不過是多重攔截的實證表達形式。幾年之間，行動者在街頭在碼頭在農村檢回屬於「本土」的碎片，以解殖作為思考方向的「本土」，就是在這裡萌芽。這種本土觀念的注碼，是某種從未出現／一直被禁止的身份認同及主體意識，以香港人（哪怕只是一部份香港人）一直以

來抵抗殖民地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壓制的傳統，奠基香港殖民地管治撤出後的主體輪廓。

這種主張一旦碰上排山倒海的內地議題，在自由行帶動的新形勢下，「本土」的語用便從歷史反省的維度猛然倒退到某種九七年前的滄白恐共對立：醫食住行等種種生活範疇統統彷彿如既倒。當盧卡奇為了反駁不必等待資本主義發展，不必等待工人的數目成為社會大多數時才能發動無產階級革命，他指出無產階級的普遍性維度不在於其人數多寡等樸素簡化的標準，而在於系統性的排斥及否定才是無產階級普遍性的烙印。這是超越數人頭式的形勢評論／分析，哲學地系統地尋找問題的槓桿支點。我城的本土論述卻由反省歷史經驗勇武地變為檢視甚麼人拿甚麼地方的護照。「本土」的口號性及民粹性操作，徹底取代了反思及創造的維度。

為了提供論述的合法性，為了建構外部它者從而創造自身，後一種本土裡香港歷史的時間跨度亦大幅縮短，未有自由行未有CEPA的香港，彷彿就是所謂「中港區隔」的理型，就是香港人的鄉愿。由於遊客、熱錢、水貨、樓價等的衝擊太過猛烈，這種版本的「本土」論述高度情緒性，「區隔」、「對立」、「拒絕」、「趕走」等用語全部成為建立香港「本土」的關鍵動詞。或許真的是香港的住宅單位、醫院床位、郊野公園露營區、油尖旺購物區的行人道都擠滿了來消費的內地人，但惹起的恐懼和拒絕卻連殖民地教導我們土地空間不過是商品的記憶都擱置一旁了。批判殖民地管治，在這種集體情緒中，要不是不痛不癢，就是投共和大中華左膠了。解殖本土的批判對象，在自治本土同樣對當前形勢的反對聲裡，完整地保存下來，並成為堂皇的反對立足點。從這意義看，香港情況雖然覆蓋範圍較小，本土論述的解殖維度，卻同樣遭遇類似的雙重詛咒。

五、未解答的問題，或，抵抗虛無

誠然，「解殖」是高度抽象的概念，而「本土」與「解殖」的關係，更是難以入屋；反之，乘著內地人及資本大舉流入香港的勢頭，將「本土」扣連為區隔的主張，是審時度勢見風駛輊的realpolitik（「現實政治」）。恐共、仇共、小農DNA、強國人隨地大便不排隊，多麼熟口熟面的批評。問題是，處處以現實政治操作為律令的自治本土論述，其城邦自治的政治主張，卻是以（等待）中國解體為前提。這當然就是現實政治的「現實」，不提「港獨」、不提篡奪中央政府政權（甚至不支持中國政體民主化）。自治本土談政治而鮮提組織及行動，儘管言論惹火，甚至將包圍上水火車站水貨客的行為視為勇武，論及政治卻一切等待那只能靜靜等待的中國解體，然後回到中國華夏文明及英國文官制度及金融系統，這場運動的內容是一一等待。

香港對於中國民主運動應有的角色，當然需要另文討論。但香港本身需要甚麼轉變？不轉變似乎就是理想，在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的論述裡，值得留意是關於經濟制度的提法。其圖像是香港應保留金融系統，甚至特別強調其協助中共富人「在香港寄存和管理財富」[iv]。產業結構上，自治運動的總綱又說：「所謂農產自保，是保存若干本土農業為農學知識基礎，並擴大香港的農產輸入來源的多元性」[v]。香港當然需以保存本土農業，甚至扭轉農業低下刻板形象，但協助中國富人寄存和管理財富，不正是目前香港最維生及致富之處麼？內地暴發戶在香港買樓買金買股票，不是因為炒高物價而令「香港人」水深火熱的元兇嗎？香港土地乃商品的觀念，炒樓為發達途徑，難道不是英國殖民者觀乎香港天然資源不多的情況下，以各種政策在殖民地時代大力推動的意識型態麼？但若自治的香港不發展一定百分比的農作物自給率，而只繼續依賴賺錢賺外匯購買入口食物，無疑是對香港社會的歷史發展缺乏反省。

在另一篇文章裡，陳雲又批評公民黨協助外傭居留權的申請權打官司，是恐懼民粹政治死抱法治主義[vi]，但這立場與自治運動總綱裡說「保留英國的典章文明」，矛盾應如何排解？數碗數碟，並不為了指出城邦自治論的概念特別多自相矛盾前言不對後語。事實上，總綱提到「促進香港食水自主、農產自保及食物安全，重振本港工業，保護本土企業（如中小企），並支持發展新產業」等，字面上完全是應有之舉。問題只是，城邦自治的「本土」，有否認真反省殖民地經驗及遺產，如何同時造就今天大家都懂得唸口璜的「核心價值」與大部份今天香港親歷的「危機」，其實不過銅版的兩面？抑或中共當前，英治時期一切「核心價值」就都照單全收？不敢觸碰當前主權國，就退守惜日宗主國，是靜態的，宿命的。懷舊的情懷容或流行，但這是殖民政權撤出後香港的未來嗎？

六、結語

馬克思引述黑格爾有云，重大的歷史事件總會發生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當然，近年對黑格爾的閱讀已開始將他從歷史發展目的論桎梏中釋放出來，不再存在超然物外的歷史判官，操縱著歷史的發展軌跡。故近年有關本土論述的演變，雖然有其特定的條件和邏輯，卻不必然指向悲觀及虛無。難道不只是如此，我們才能避免問到諸如：解殖的本土觀點是否過時了？是否給反蝗反雙非的本土觀點擊敗了或抽水收割了？相反，該問的問題是，今時今日一片仇恨的氣氛裡，我們能否不在對手定義的戰場，作「嚴格意義的行動」？

從事後的眼光看，盧卡奇在史大林時代的確沉默了，但亦正在這後來的沉默中，顯出他列寧主義時代思考的銳利及前瞻性。他批判的觀點或許沒有協助建築任何實證的現實，但卻能成為超越時代的拷問。珠玉在前，關於解殖的本土，未完的思考就是未完，不會因為話題已轉而神通地完滿解答。這當然不是答案的全部，但不能輕易回答的問題，難道不是答案重要的構成部份麼？

[i] 見工業貿易署，「CEPA專題網頁」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

[ii] 根據黑格爾的辯證法，齊氏在書裡提出了一套哲學版本的演繹：

圖示（「--」為同一性關係）：

- 1) 馬克思：無產階級 – 歷史發展（中介：馬克思主義政黨）
- 2) 列寧：先鋒黨 – 歷史發展（中介：無產階級）
- 3) 史大林：蘇聯共產黨 – 無產階級（中介：歷史發展）

馬克思主義就是強調無產階級本身等同於歷史發展，其身處的社會經濟位置便預告了革命的發生，政治組織（例如共產黨）不過是特定中介，協助本身有這種意

識或潛能的工人階級實現革命等歷史發展。二十世紀初的列寧主義，則是否證了原先共產黨作為中介項的關係。列寧認為，以十九世紀的經驗來說，若不給予任何領導，工人最多只能發展出工會意識，即爭取福利、改善工作環境之類，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意識所指向的推翻資本主義及執政。專業革命家才是歷史發展的關鍵，他們組成的共產黨與歷史發展之間才是實至名歸的等號。是先鋒黨先掌握了歷史發展的機會及軌跡，才能領導廣大的無產階級成為推翻沙俄政權，建立蘇聯。在先鋒黨及歷史發展的同一性關係裡，無產階級才是中介。到了史大林，他進一步將否證了無產階級這中介項。在馬克思主義從革合理論化身成替蘇維埃政權提供合法性理論的這背景下，中介項由無產階級變為歷史發展。黨洞察形勢領導群眾起義的功能退下，史大林主義的當務之急是如何鎮壓異見之餘同時向外宣稱仍然代表廣大人民。以前面的概念來說，建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同一性就是其統治的依據，所謂「歷史發展」只不過是口實性質的中介。

Slavoj Zizek, "Postface: Georg Lukacs as the philosopher of Leninism", in G Lukács, A Defenc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London, 2000)

[iii] John Ress, "Introduction", in G Lukács, A Defenc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London, 2000). p.9

[iv] 陳雲，〈香港城邦 中國門戶〉，刊於《AM730》2011年3月22日。

[v] 陳雲，〈堅持香港自治 保衛自由城邦—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總綱〉，http://hkam2011.blogspot.hk/2011/06/blog-post_25.html

[vi] 陳雲，〈中產創傷，民粹抬頭〉，2011年11月8日，<http://hk.news.yahoo.com/blogs/sandwich/%E4%B8%AD%E7%94%A2%E5%89%B5%E5%82%B7%E6%B0%91%E7%B2%B9%E6%8A%AC%E9%A0%AD.html>

評論及回應：

本土眾數的可能 (梁啟智評論)

多元民主運動的可能性 (林藹雲評論)

什麼是香港自主性的體現？(周思中回應)

承認本土主義帶來的改變 (葉蔭聰評論)

